

中国出版史研究

第1期
2022
(总第27期)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Publishing in China

引领与推进：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概览·姜小青

地缘与出版：以亚东图书馆为考察中心·林英



从五人日记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的召开·齐澆心

“版权”的名实之辨：评王飞仙《盗版商与出版人》·邱雪松

定价：58.00元

ISSN 2095-8889



主管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主 编: 杨牧之

副主编: 李占领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余光	方晓阳	冯宝志	刘运峰	李占领	李 频
李景端	杨牧之	吴道弘	吴永贵	余 喆	邹振环
辛广伟	汪家明	张志强	张树栋	陈 力	周洪波
周蔚华	俞国林	贺圣遂	顾 青	魏玉山	

常务编委: 余 喆

编辑部副主任: 张玉亮

英文翻译: 王旭静

英文专业外审: 刘 敏

责任编辑: 张玉亮 胡雪儿

封面设计: 周 玉

期刊名称: 中国出版史研究(季刊)

网址: <http://www.zhbc.com.cn>

主管: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子邮箱: chubanshi@zhbc.com.cn

主办: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出版: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发行: 北京市邮政报刊发行局

编辑: 《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

邮发代号: 80-142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frac{\text{ISSN } 2095-8889}{\text{CN } 10-1176/G2}$

邮政编码: 100073

出版日期: 2022 年 1 月 20 日

电话: 86-10-63458238

定价: 58.00 元

本刊同时享有文章的网络传播权及其转授权, 授权的种类为独占许可, 稿酬中已包含对上述权利的使用收益。

目 次

卷首语 本刊编辑部 (3)

本刊专稿

以书致治: 清初官方的书籍出版与颁赐 高学姣 (7)

高士奇、朱彝尊与康熙的类书因缘

——以杜公瞻《编珠》的发现和编刻为中心 王京州 (24)

新旧之间: 江楚编译局始末 王晓霞 (35)

引领与推进: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概览 姜小青 (48)

专题研究

从两分到三分: 清代版刻字体的程式与分化 郑 幸 (60)

女学、画报、读书会: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女性阅读秩序重建 乔晓鹏 (76)

近代中国儿童画报考述 王丽歌 刘奥林 (87)

在互动中彰显“五四”立场

——以茅盾主编《小说月报》“通信”为例 钟桂松 (97)

《时代漫画》的“编辑—作者”互动探略: 从一位无名投稿者说起 王 琳 (111)

地缘与出版: 以亚东图书馆为考察中心 林 英 (123)

地方出版何以崛起: 以广东为中心的研究(1978—1985) 金炳亮 (132)

史料钩沉

从五人日记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的召开 齐浣心 (154)

“大字本”线装书在天津 陈益民 (165)

书评

- “版权”的名实之辨: 评王飞仙《盗版商与出版人》…………… 邱雪松 (172)
- 权与利的纠葛: 评王飞仙《盗版商与出版人》…………… 陈冕 (178)
- 《盗版商与出版人》补遗: 对两篇书评的回应…………… 王飞仙 (185)
- 出版大事记…………… (192)

CONTENTS

Consolidating Governance with Books: Official Book Publishing and Granting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Gao Xuejiao (7)
Connection of Gao Shiqi and Zhu Yizun with Kangxi by Compilation of Reference Books: Centered on the Discovery and Compilation of Du Gongzhan's <i>Bian Zhu</i>	Wang Jingzhou (24)
A Mix of Old and New: On the Jiangchu Translation and Editing Book Company	Wang Xiaoxia (35)
Leading and Advancing: An Overview of the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Plan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Xiaoqing (48)
From Dichotomy to Trichotomy: Forms and Divisions of Engraved Fonts in the Qing Dynasty	Zheng Xing (60)
Women's Studies , Pictorials , and Book Club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Women's Reading Order in the Period of the Late Qing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Qiao Xiaopeng (76)
An Examination of Pictorials for Kids in Modern China	Wang Lige & Liu Aolin (87)
The "May Fourth" Stance Shown in Interactions—On the "Correspondence" Column of the <i>Fiction Monthly</i> Edited by Mao Dun	Zhong Guisong (97)
An Exploration of Editor–Author Interactions in the <i>Modern Sketch</i> : the Story of an Unknown Contributor	Wang Lin (111)
Geographical Factors and Publishing: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the Oriental Book Company	Lin Ying (123)
Reasons behind the Rise of Local Publishing: A Study Centered on Guangdong (1978–1985)	Jin Bingliang (132)
A Glimpse into the Founding Meeting of the Planning Group for the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Books from Five Persons' Diaries	Qi Huanxin (154)
"Big-character" Thread-bound Books in Tianjin	Chen Yimin (165)
Copyright in China: Remain in Name but Not in Reality? —A Review of <i>Pirates and Publishers</i> Written by Fei-Hsien Wang	Qiu Xuesong (172)
For Power or for Money— A Review of <i>Pirates and Publishers</i> Written by Fei-Hsien Wang	Chen Mian (178)
Addendum to <i>Pirates and Publishers</i> : Response to Two Book Reviews	Fei-Hsien Wang (185)

“大字本”线装书在天津

陈益民

【摘要】“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主席视力不好,中央决定印大字本线装书供他阅读,同时也分送中央其他领导人。大字本线装书印制要求高,品种繁多,尤以“二十四史”的出版计划最为宏大,当时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承担此项目。后因出版困难多多,又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项目终止,最终仅中华书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部分正史,其他社未能完成各自原来分配的任务。

【关键词】“大字本” 线装书 “二十四史” 天津人民出版社

DOI:10.19325/j.cnki.10-1176/g2.2022.01.013

“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主席视力不好,中央决定印大字本线装书供他阅读。所印之书同时也分送中央其他领导人。大字本线装书从1971年开始印制,至1979年终止,前后历时8年。品种繁多,其中尤以“二十四史”的出版计划最为宏大,由京、津、沪三地的几家主要出版社共同承担此项目。此项目的出版要求保密,文字的字体和大小有特殊要求,版面字数也有严格规定,专门定制了精良的纸张,印刷工艺也要求高质量,明显体现了当时特殊出版物出版的时代特征。然而,由于出版困难多多,进展十分缓慢,后又随着毛泽东的逝世而项目终止,最终仅中华书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部分正史,其他社似未如期赶制出计划由其出版的正史项目。

那些已出版的大字本正史,成为一个时代的精致而独特的品种。应当承认,它们的出版过程带有过多的政治色彩,然而,对于当今的出版工作来说,其中也未尝没有可资借鉴的地方:其一,将类似的大字本线装书作为礼品书推向当今的市场,仍有广阔的市场潜力,证明这样的好书,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其二,在当今特别强调主题出版的形势下,当年“大字本”的出版过程,也能给我们许多启示,诸如多家出版社分工协作出版同一套代表国家水准的图书,为一套特别的书而制作一套新字体,对书籍编印的各个环节严格进行质量把关,对于从事这项工作的编印人员予以专门的培训,当地党的宣传部门直

接抓这项工作,政府部门专款资助,等等,都为这套高标准的图书提供了很好的保障。大字本线装书的出版历程,在某些方面,仍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其中的经验并吸取教训的。

—

毛泽东晚年视力不好,而他又嗜好读书,尤爱读古书。他书房里的书,以线装古籍居多。而铅排五号或小四号字的图书,在他看来是笔画细、字太小,开本也小,得借助放大镜才看得清楚。于是,为了方便他阅读,中央决定印制大字本线装书。

其实早在1965年,毛泽东视力还好的时候,就曾提出印“大字本”的事。当时他读到一本大32开本的《近代逻辑史》,颇觉不便,就给秘书留言:

田家英同志:

此书印大字本一万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读线装书本来就是毛泽东的喜好;而后来视力越来越差,大字本线装书更成为他的迫切需要。1971年以后,有关方面专门印制了一系列这样的书。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毛泽东赠给田中首相的国礼,就是一函6册的大字本线装《楚辞集注》,足见新印大字线装古籍有很好的品质,可作国礼。

毛泽东向来强调中央委员要多读书,大字本线装书也就成为给中共中央特别印制的图书。当时一般印一百余册(亦有印数百册者)。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对外保密。参加编印的人员,最初还要查成分、查背景,必须根红苗正,一度还要求参加编印的人写下保证书,保证认真做好编印工作,保证保守这一国家秘密。据上海市革委会一份文件规定,按中央要求印制的大字本线装书,“上海市委送五套,文教组送一套,印刷公司一套作档案留存,印刷厂不得留样书(后改为允许留一套——引者注),出版社一套作为样书。凡是印刷过程中剩余的半成品、残纸片,由出版社、印刷厂督促烧毁,做保密件处理,成品半成品、残纸片不得外流”。这应是当时中央对京、津、沪印大字本线装书的统一要求。

据毛泽东的图书服务员徐中远统计,从1972年印制的大字本线装《鲁迅全集》到1976年的大字本线装《容斋随笔》,约有新印的129种(部)线装书经毛泽东翻阅或圈点过。而实际印制的这类品种,远不止这个数。

当时,工作人员整理毛泽东喜欢读的书目,经其同意,报国家出版局去印制。印出来的书送中央,也分发给中央委员。其品种不限于古籍,还包括:毛泽东著作(如《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等)、《鲁迅全集》、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如《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翻译经典作品(如《拿破仑传》《物种起源》)之类。甚至还包括一些轻松的通俗读物(如《历代笑话选》《新笑林一千种》《一千零一夜》等)。偶尔江青也会声称要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发送配合政治形势的作品,而要求印制大字线装书。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线装本《小靳庄诗歌选》就是在江青的指令下出版的,印制了三百册。此外,“两报一刊”(“两报”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红旗》杂志)上发表的一些批林批孔文章(如《红旗》杂志1974年第6期刊登梁效《论商鞅》、197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刊登廖钟闻《尊儒反法的〈辨奸论〉》之类),也不时被要求印成大字线装本。可见大字本线装书,当年出版的类别是有点杂乱的。而用白话文写成的诗文,印成线装古籍样式,可谓旧瓶装新酒,总显得不伦不类。而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奇异现象。

二

大字本线装书最初主要由中华书局印制,随着要印的品种日渐增多,中华书局一时赶制不出那么多品种,因而又增加了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只印过半部大字线装《鲁迅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其中“二十四史”正史的出版,是当年最宏大的大字本线装书出版计划,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担了其中的六部,即《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元史》《明史》。估算字数为1428万字,计划于1977年底全部完成。

毛泽东喜欢倚靠床头读书,一手拿书,一手拿笔。因而出版大字本线装书有特别规定,每一册不允许太厚,以便一手拿着方便。通常每册40页,40页文字排满,内容就转下一册,而不考虑篇章段落的完整性。自古以来古籍印制出版,是不会如此分卷的,这也成为大字本线装书的特殊性之一。再者,为了视觉上显得疏朗清晰,最初规定,每页8行,每行14字。可知一册连空格在内,可容纳的文字量仅4000余字。这意味着每一部正史,都将会有很多册。后来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每页文字字数有所调整,改为每页10行,每行21字,实际上适当增加了每册的文字量。

大字本线装书在出版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一份有关天津人民出版社派人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学习“大字本”线装书出版的材料称:

“大字本”是供中央领导同志阅读的书籍,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这个任务的特点是工作量大、时间要求急、变化多。对于中央交下来的出版任务,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有的需要个把月要书,有的半月、二十天要书,有的两三天内就得出书,甚至一套分为十六七分册的书,急到订出一本送一本的程度。同时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各种“大字本”的先后出书顺序也时有变化,……有时已经发排了,有更急的任务下来,就放下手中排活,改排更急的。就是机器已经上版了,也有时落版另上新任务。(《关于赴京学习“大字本”线装书版式设计问题的纪要》)

可见当时这是作为严肃的政治任务对待的,随时要跟着上级的指挥棒走。

而困难还不止于此。

首先是相关的厂房设备需要投资建设:对于长期未做线装书的出版社来说,要新成立“大字本组”,须在印刷厂设立专门的大字本线装书车间,建造专门的纸库,储备大量宣纸;建造书库专门放置印出来的大字本。国家计委“1974计计字588号”文件说:为解决大字线装书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国家计委特批准天津市增建厂房、书库、纸库投资95万元。天津市文化局于1975年1月给市建委的《关于要求抢建大字线装书基建项目的报告》称:增建厂房、书库、纸库等的总投资为95万元,其中500平方米纸库须14万元,1300平方米排字车间须13万元,新华书店500平方米书库须5万元。此外还须购买纸张、设备,培养编、校、印古籍的人才,搜求恰当版本等。因出书有时间限定,基建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完成,其他工作也须统筹尽快进行。

其次是缺少有编印线装古籍经验的编辑、校对人员和印刷工人。当时不少文史专家被关“牛棚”、下放改造,拥有专业知识的古籍编校人员非常缺乏。为此,既要专门从社外调来新的合适人员加入,又要进行线装古籍的出版业务知识学习。然而,直到1975年8月,仅新调来编辑6人,校对2人,印刷工人4人,与原计划和实际需要的人数相去甚远。甚至直到1976年3月,当时的档案材料还在说,“由于人员还没有配齐,不宜于开展较为大型的‘练兵’活动”;并认为,“由于人力不足,对完成中央任务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后来的实际出版情况也与国家最初的出版计划存在巨大差距。

最后,这项工作还牵涉京、津、沪三地的协调问题。一份天津人民出版社所藏档案说,“印刷一厂已经按照新的版式规定排出了样张,如果我们认为合适,工厂即可着手赶铸装饰边线和填空材料”,但其中有些问题“涉及京津沪三地统一规格问题,我们定不下来,需要和中华书局共同研究解决”。而北京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大字

本”直至1974年年底,版式尚不完全统一,有边框线的粗细不同,有前言在目录前和目录后之别,有每页文字行数、每行字数不同,等等。而确定统一的字体,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这都成为这一出版计划进度所面临的困难。

三

因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的独特性,有关部门对其出版质量的要求非常高。不仅是纸张、用墨的质量,还有印刷、装订的质量,尤其特别关注的是编校质量。其使用的大字,是专门设计铸造的新型字体。原打算用一号长仿宋体铅字印大字本,这在北京、上海、天津的许多印刷厂里都有现成的铅字,但因其笔道较细,不便于视力不好的人阅读,于是国家出版局又从全国组织了一些专家,专门设计并确定了一种“36磅”的长宋字体。每字高12毫米,宽8毫米,比原来的一号长仿宋字更清楚好看。当时从全国各地召集了几十名刻字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刻制了四套36磅长宋字体的字模,制好后北京留两套,上海、天津各分配了一套,从而可以保证新印的“二十四史”所有书的字体字号的统一。

古籍中的用字没有统一的汉语规范标准,异体字很多。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字简化改革已卓有成效,对于新旧字型(包括部首)都有了明确规定,有些旧字型(含部首)如“嗽”“靛”“糸”“刃”“户”,新字型确定为“嗽”“靛”“糸”“刃”“户”。旧时的异体字有了统一的规范,有助于这套书避免古籍中那种异体字太多的乱象。然而,在明确和规范异体字时,同一个字,因较多地考虑了现代汉语应用的情况,所以也可能忽略该字在古时应用的广泛程度。例如“吴”与“吳”,“真”与“眞”,“争”与“爭”,“為”与“爲”,“潜”与“潛”,“盗”与“盜”,等等,实际在古时,后一字比前一字可能应用更频繁。而新大字本却以前一字作为规范字。从这一点来说,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可谓有古代线装图书外观之形,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线装古书文字之体。

此外,古书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史记》中,越王“勾践”,又写作“句践”,所依据的原著版本本身就未必统一,大字本也就尊重原书,未予修改。而“敕”字,同一部古书中就可能还并存着异体“勅”“勅”,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只求本页统一,不求全书统一。这种处理方式是否妥当,尚值得商榷。而这也算是大字本线装书正史文字处理的特点之一。总之,不同的史籍、不同的版本,乃至同一部史书中,同一个字,在同一篇章或不同的篇章中可能呈现着不同的异体,究竟选取哪一个作标准字,却是很不易做到绝对合理的。

当时的出版进展很不顺利。1974年天津方面就接到了中央布置的“二十四史”大字本